

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三维探赜

薛浩¹, 朱新屋²

(1. 西安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清末民初,由于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分布差异,一条从陕北北部向南部迁移的路线即“下南路”逐渐形成,这种自发而又零散的移民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应对财政危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因应时势,逐步完善移民政策,将自发、零散的“下南路”移民活动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并同群众密切结合而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运动的兴起是历史传统、现实矛盾及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在合理调配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下南路”;移民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24)04-0049-08

收稿日期:2024-04-25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骨干培育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与抗敌后援会研究(1937-1945)——基于政治动员的研究视角”(JSG2022007)

作者简介:薛浩(1996—),男,陕西延安人,西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长期面临复杂棘手的移难民^①问题:一方面,大量来自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移难民涌入边区,同时边区内部也存在人口流动现象,须妥善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在大生产运动背景下,官方亟需通过移民以促进人口合理布局,进而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在加强社会保障和大力发展生产的双重目标下,妥善安置移难民并鼓励其参加生产成为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同边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正因如此,边区的移难民问题向来受到学界重视。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边区移难民的迁移原因、来源、数量变化、职业构成以及边区政府的优待政策、安置措施、工作成效和影响等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②但相对而言,边区的“下南路”移民运动被湮没在宏大的移难民叙事当中,现有研究对此关注相对不足。实际上,尽管“下南路”移民活动由来已久,但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下南路”由历史上农民自发的逃亡路、谋生路成为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富裕的翻身路、致富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拟通过梳理“下南路”移民活动从自发、零散状态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历史过程,结合近代陕北地区的移民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社会状况以及党和边区政府解决移难民问题的思

^①“移民”指出于各种目的和动机离开原居住地的人,“难民”指受外力压迫下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的人。由于边区兼而有之,且不易区分,因此一般统称为“移难民”。

^②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志红《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高冬梅《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严艳,吴宏岐《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安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汤春松《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移难民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宋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陕甘宁边区移难民安置为个案》,《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等等。

路与具体政策的调整,探究党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用传统资源以应对复杂时局的历史经验。

一、历史传统:近代“下南路”移民活动概观

虽然传统乡土社会历来安土重迁,但中国历史上移民活动依然十分频繁,除了省际大规模移民,地区性人口迁移更是不胜枚举。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动荡不安,逃荒移民活动屡见不鲜。古代陕北民众逃荒大致有三个方向:“下南路”“走西口”“东渡黄河”。其中,“下南路”亦称“走南路”“跑南路”或“滚南老山”,指的是陕北绥德、米脂、榆林、横山一带民众南移谋生。陕北中东部各县如绥、米、榆等地人口集中,“一遇灾荒年,人口就自发地向南部诸县迁移”,^{[1]18}因为对于这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来说,“延属各县的荒地和人手不足的农场一直是一个安全阀”,^{[2]92}足以保证渡过灾荒。

早在清末民初,“下南路”移民活动就已相当普遍,这主要缘于当时频繁的战乱、灾荒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地人口分布差异。同治六年(1867),西捻军受清军逼迫转入陕北,并与回民起义军配合作战,最终在清军左宗棠部的镇压下得以平息,但战乱使得陕西、甘肃人口锐减,给陕北民众带来沉重灾难。在元气未复之时,光绪初年(1877-1878)爆发的“丁戊奇荒”又波及整个西北,引发陕西中北部地区“新的迁移浪潮”。^{[3]196}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差,陕北虽处于灾荒的边缘区域,“但其人口损失相对比例可能不比灾荒中心的西安、同州两府低多少”。^{[4]357}总之,同光年间的战争和灾荒使陕北人口大幅减少,据民国《甘泉县乡土志》记载:“本境户口,经同治六年先以兵荒,继以疾疫,终以野狼伤人,于是逃亡者过半,后复经光绪三年奇旱、二十六七等年饥馑而逃散死伤者又去其十之七八。”^{[5]411}不过,由于各地的防御能力和恢复能力不同,战争及灾荒的破坏程度在陕北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对保安、延安等南部各县农村社会的肢解破坏远大于绥德、米脂等北部各县。晚清时期绥德州、榆林府同延安府人口变化趋势的不同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见表1),具体到县份也是如此:1823年保安县人口为5.1万人,到1868年只剩170人,1823年延安县有人口61200人,到1930年人口仅约1万人;相比之下,绥德县1823年的人口是11.3万人,而1930年却反增至15.2万人。^①

表1 晚清时期陕北地区人口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人

	1861年	1867年	1876年	1880年	1910年
绥德州	35.7	32.1	34.5	25.9	34.5
榆林府	62.2			41.7	50.6
延安府	70.6			30.0	15.3

资料来源: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5卷(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600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北自然灾害频发。由于延安地区灾情相对较轻,且有着相隔较近、地广人稀等地理优势,所以“绥德、米脂、横山一带的饥民逃荒来延安”^{[6]90}的移民明显增多。尤其是1928-1931年榆林地区连年大旱,鼠疫、霍乱等疫病相继流行,人口损失惨重,“逃亡山西、延安等地者甚多”。^{[7]129}但是,不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下南路”移民都缺乏关注,也没有能力应对这一社会问题,陕北人口“终未恢复旧观也”。^{[8]704}其主要原因在于,陕北南部“各县对于垦荒人民,无切实保障”,^{[9]52}导致灾民多裹足不前,即使迁移也根本无法安身立命,往往渡过灾荒稍有积蓄后即返回原籍,或继续迁徙逃亡。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陕北特委发现延安地区土地多半荒芜,且耕种者以绥、米一带破产农民居多,但是每年所获2/3都要用来交租纳税,因而移民“不特不增加,反而偷跑,以致虽有土地也无人耕种”。^{[10]407}与此同时,人口稠密的绥、米、葭、吴、横等地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农民遭受来自地主、豪绅、军阀和官僚各方异常残酷的剥削,农村经济趋于破产。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当时政府对移民不闻不问,任其自流,不加以保护,移民就无法存在”,^[11]人地矛盾非但无法解决,甚至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撕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战乱和灾荒相互交织的局面,陕北党组织在开展救荒的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思想主张,“宣传灾荒的社会根源,以发动农民瓦解国民党的军阀统治”。^{[12]104}这成为陕北红军、革命根据地创

^①相关数据源于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延安道路的生态起源》,参见《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建与发展的重要契机,为抗战时期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二、现实矛盾: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生态

陕北地区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生态环境异常脆弱。在这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下南路”移民活动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愈发活跃。

(一)苛政与战争

陕北政区变迁频繁,政治环境异常复杂。1934-1935年,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对百姓勒索敲诈、强征民夫、烧杀抢掠,人民无不怨声载道。随着中日民族矛盾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划绥、米、葭、吴、清5县为警备区,由八路军驻防。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具体管辖范围长期拖延未予答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政府机关仍然设立在县城,同时又有八路军驻守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活动,形成“两种政权机构并存的状态”。^{[13]21}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不仅积极反共,破坏统一战线,而且横征暴敛,人民深受其苦,遂纷纷逃离南下。1939年秋绥德地区遭遇旱灾,加上捐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乃相率逃来边区谋生,多聚集于延安市区及县区”,^[14]自3月以来总数已达四五千人。为确保边区社会稳定,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边区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将专事摩擦的国民党地方官员驱逐出边区。1940年,绥德警备区5县全境获得解放,纳入边区管辖,并据此设立绥德分区。但几年来持续的荒旱导致“饥民载道,多吃草根糟糠度生”,^[15]尽管边区通过发起“节省一两米运动”以及募捐活动救济绥德分区,南下民众仍然络绎不绝。

全面抗战时期,虽说边区总体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但黄河东岸的日军不断侵扰绥德地区,频繁的轰炸和炮击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小的威胁。据边区救济分会统计,吴堡、葭县、绥德、清涧4县民众“被炸死者就达182人,炸伤542人”。^{[16]39}大部分灾民虽经安置照顾,但生活仍很困难,“尚有一部分流落他乡”。^{[17]103}1938年3月,日军连日炮击绥德、吴堡一带,国民党当局却“用打骂代替教育”,大肆强拉民夫且克扣饷银,部分群众“怕抽壮丁向延安一带逃跑”。^[18]可见,战争威胁成为许多民众迁徙的又一诱因,绥德地区群众或为躲避战乱或为逃避兵役纷纷“下南路”。

(二)灾害与生态

生态破坏与自然灾害往往相伴而生、相互作用。人类无节制的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进而引发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反之,自然灾害除了对人类与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外,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具有很大影响,“并通过自然生态环境功能结构的破坏反作用于人类与人类社会”。^{[19]21}中国历代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北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使得植被破坏严重,造成土地荒漠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料显示,1926年榆林府所存树木“仅少数之杨柳而已”,^{[20]92}沙漠已侵入该地且有进逼内地之势。时人描述:“北风一起,即旋捲南侵,榆林之鱼河堡,原为沃土,今已为黄沙埋其大半矣。”^{[9]52}到抗战时期,风沙进一步南侵,陕北民众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延(安)绥(德)道上,“风沙弥天,暗不见人”。^[21]陕北的沙漠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已经侵吞了榆林、横山,其南缘已经到达绥德南部的米脂城。所到之处,田陌变沙滩,气候干燥,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绥米一带的居民一批批地向边区森林里面迁居”。^{[22]28}

由于生态环境恶化,陕北自然灾害也随之变得频繁,“在边区内部形成了大量的移难民”。^{[23]57}边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多变,雨量不均,灾害频发,其中陕北北部更是灾害高发地区,每年都会受到旱、雹、水、风等多种自然灾害的破坏,旱灾尤其频繁,素有“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说法。然而,传统农业社会异常脆弱,农民基本靠天吃饭,往往无力应对灾害。除了坐以待毙,逃荒便成为农民活命的唯一出路。1939年靖边县遭遇大旱,庄稼绝收,“流离外移者络绎不绝”。^{[24]305}由此可见,由于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在自身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下南路”就成为众多陕北民众的现实选择。基于此,边区创造了“移民救灾”的方法,组织灾民“下南路”开荒,通过自给生产度过灾荒。

(三)土地与劳力

“下南路”移民活动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地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陕北北部人口稠密、南部人口稀少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而且黄河东岸不断有移难民越过黄河涌入绥德分区,^①

^①尤其是靠近黄河的吴堡县,1942年4月间逃入6000余人,1943年冬日军在山西大肆“扫荡”,更是一夜间逃入3万余人。参见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进一步加剧了该地的人地矛盾。数据显示,绥德分区人口密度为47.4人/平方千米,其中绥德县和吴堡县更是分别达到每平方千米73人和83人。然而,整个边区人口密度为15.2人/平方千米,即便是延安周边地区也只有16人/平方千米,绥德地区人口之密可以想见。^①更重要的是,绥德分区不仅人口相对稠密,而且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新区,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尽管党把“减租减息”确定为抗战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但绥德分区贯彻落实不彻底,“很多地方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现象”。^{[13]73}根据绥德县一个村的统计,全村14个租户中按照政策规定六成交租的只有1家,“其余13家都照原租额交租”。^{[25]66}

绥德分区这种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土地集中于地主的情况,造成两个极坏的后果:一是可耕地都被利用,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二是农民受尽地主剥削,生活水平低下。尽管绥德分区属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但由于地力的尽量利用导致土壤逐渐贫瘠、肥力持续下降,平均亩产量只有0.94斗,仅略高于地近沙漠、环境恶劣的三边分区,更不如广种薄收的直属各县。“在耕地少、人口多且亩产低的条件下,绥德分区粮食人均年消费仅有6石,处于边区最低水平。”^{[26]12}部分群众生活难以为继,就只得向南部迁移,米脂县一个村389名劳动力中到“南路”做工、种地、赶牲口的合计达48人,“约占全村劳动力的八分之一”。^{[27]13}

除绥德分区外,边区大部地广人稀,特别是延属分区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却苦于劳动力不足。以开垦荒地为中心的春耕运动一直以来就是边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尤其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得开荒活动更为活跃。但是,延安周边的直属各县劳动力缺乏,耕地面积扩增缓慢,成为边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直到1939年,边区4000万亩的可耕地中已耕面积还仅为900万亩,“尚有广大地面可供开发”。^{[24]112}1941年9月,延安县长刘秉温在该县参议会上表示,该县荒地占土地面积的2/5,劳动力仍感不足。延安四科长吴力永直接负责该县经济建设,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缺乏的窘境深有体会,“我们只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了”,这导致发展生产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不怕移来的人多,愈多愈好”。^[28]

总之,绥德分区耕地稀少、人口稠密而延属分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矛盾长期未能得到解决,严重制约着两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这既是民众自发迁移的现实考量,也是党和边区政府开展移民运动的深层次原因。

三、政策支持:中共对“下南路”的应对与调适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乱、灾荒以及苛捐杂税等因素,不断有流亡难民从沦陷区和国统区进入边区,边区内部也存在移民活动。在应对和处理移难民问题时,党和边区政府大体上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因应的过程,即从单纯赈济救助转变为鼓励移民垦荒。

(一) 抗战初期救济难民工作

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时,面对的是一个长期遭受战争创伤和灾荒肆虐的陕北社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民众受战争影响过甚,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下南路”逃荒者啼饥号寒,国民政府却无力解决。随着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大批难民受战乱、灾荒等因素涌入边区,“下南路”移民活动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好陕北地方社会,如何建设模范边区,如何巩固抗日根据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执政考验。

起初边区人口流动整体上还处于自流状态,党和边区政府实行救济难民的政策,对难民更多的是赈济与救助,没有普遍安排其从事生产。边区政府成立前,一般将难民纳入优待红军工作人员家属政策当中,以此作为救济办法之一。1937年4月,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抽拨两万元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工作人员家属和难民。同年6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1937年7月-1938年12月)》提出,要救济流亡难民、红属、工作人员及退伍士兵,帮助调剂粮食并贷以资金维持其生活。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对难民的救济安置工作,发布了一系列专门政策和指示。1938年9月5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关于边区赈济难民的刍议》的社论,指出在紧张的抗战局势下,难民问题关乎抗战大局,是亟应解决的问题之一。1940年3月30日,边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指出,无论外来难民还是区内贫民,只要生活困难即予以救济,其中“积极中的积极办法”应当是将难民“加以政治的、军事的训练”,^{[29]67}然后组织回乡,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

显然,在大生产运动深入开展以前,党和边区政府对难民的处理倾向于较为被动地救济。尽管1940年

^①参见梨小苏《陕北榆林经济概况》,《西北研究》1941年第7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以前边区也偶有收容移民开荒的行为,但更多是出于避免使其“走入饥饿死亡或流为盗匪”。^{[24]121}此时边区对待移民更多的只是安置照顾,组织开荒耕种只是作为一种积极的救济手段,并没有主动招徕移民。

(二) 移民政策的确立与完善

边区的移民政策是在面临严重困难并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步确立与完善的。一方面,窘绌的财政越来越难以负担庞大的赈济经费,必须改变传统的救助办法而组织移民自救;另一方面,边区中心区域劳动力的缺乏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利用移民以增加人口成为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部分移民南下后生活困难,受到当地民众的排挤,需要干预纠正。因此,移民政策的颁布首先包含了保护移民的出发点,及至后来优待并发动移民垦荒就既包含着使移民翻身致富达到社会救助的目的,也包含着利用移民群体这一劳动大军发展生产、繁荣边区经济的目标,而且后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边区组织发动移民进行开荒生产的指向性越来越强。党和边区政府及时转变思路,主动介入这一自发、自流的迁移活动,工作重心也由赈济转为组织移民生产自救。经中共中央批准,边区颁布“五一施政纲领”,把“奖励外来移民”作为“发展农业生产”^{[30]92}的重要手段。在1940年经济建设计划中,边区党委和政府提出应该颁布优待条例,通过分配土地、免缴公粮的办法来吸收移民,增加边区人口。1940年3月1日,《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公布了移民优待条例,边区移民政策初步确立。此后,边区政府陆续颁布大量决定、办法、条例,边区移民政策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见表2)。

表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移难民政策文件

颁布时间	文件名称
1940年3月1日	《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
1940年3月30日	《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
1940年	《移民垦殖暂行办法》 ^①
1941年1月25日	《关于优待移民的布告》
1941年4月10日	《颁布优待难民办法的布告》
1942年2月6日	《为公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
1942年4月5日	《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
1942年12月2日	《关于安置难民的通令》
1943年3月19日	《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
1943年6月24日	《巩固移民并准备大量移民条件》
1945年	《1946年移民计划及实施办法》

资料来源: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边区的移民政策逐步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优待对象从区别对待到一视同仁,不再区别对待移民、难民,《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将符合条例所列情形的垦荒者统一称为“移难民”,并同等适用政策。第二,优待办法从随意性大到量化固定,如将“免纳二年至五年之土地税(或救国公粮)”^{[31]84}统一为三年免征以保证公平合理。第三,边区内部的“下南路”移民逐渐受到重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明确将区内移民纳入优待政策,“绥德分区各县和神府县移入延安、甘泉、安塞、保安、华池等县,从事农业开垦者,均为移民,得享受本办法的优待”。^{[32]211}

尽管1940年到1942年边区制定了一系列移民政策,但移民效果不佳,出现移民增长率下降的情况,绥德分区“地少人多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33]此外,由于抗战以来边区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尤其是在历年

^①《移民垦殖暂行办法》颁布时间,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记载:“可能是1940年文件。”(该书出版信息见表2资料来源)由于边区政府在此之后的历次政策回顾中并未提到该文件,考察其政策内容明显超前,与前后政策没有连贯性,推断其并不是1940年颁布或当时并未公布施行,故而存疑。

开荒运动的开展下,延属分区“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29]456}要想做到全部开发与利用,“尚有待于大量移民”。^[34]在这一背景下,1942年初由高岗率领的西北局考察团到绥德、米脂一带进行调查研究,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认为“绥、米地少人多,应提倡大量移民,使与地多人少的某些老边区相调剂”。^{[27]22}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边区中心工作的正确方针,毛泽东肯定了移民政策对边区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指出“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35]756}而开荒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步,也是边区增加粮食的重要手段,应该“主要靠招集移民来开”,而且“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35]769}即各级政府动员组织移民南下生产。会议闭幕后不久,边区政府即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标志着边区移民政策基本成熟。正是由于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移民政策并不断发展完善,从而为开展“下南路”移民运动奠定了政策基础,适应了边区迅速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的需要。

(三) 移民运动的移出与安置

随着组织发动移民的指向性越来越强,加之边区移民政策逐渐成熟,党和边区各级政府上下联动、密切配合,边区的移民工作尤其是“下南路”移民活动成为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

作为边区移民运动的主要迁出地,绥德分区针对群众当中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谣言蛊惑人心以及资金缺乏等搬迁的实际困难,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办法:宣传鼓动,解释优待政策,用发财致富的实际例子发动移民;积极帮助移民解决各种困难,为其顺利南下提供保障;树立模范,开展移民竞赛,带动全区移民热潮;贫富合作,鼓励投资开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政府组织动员,大量移民积极南下,移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绥德地区约有5万人“下南路”(见表3)。尤其是在1943年至1944年,边区开展了“马丕恩移民运动”和“汪丕应移民运动”,移民人数因此大幅增加。“马丕恩移民运动”^①主要是政府依靠各级干部向群众宣传边区优待移民的政策和马丕恩勤劳致富的事迹,从而动员移民南下。清涧县实行“干部领头走”^[36]的办法,给予区乡干部一定的移民任务,如城关区助理员惠安藻和二乡乡长陈进禄率领12名群众一起南下开荒。与“马丕恩移民运动”相比,“汪丕应移民运动”“不仅规模宏大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且多系由群众领袖号召,人民普遍响应”,^[37]真正实行了毛泽东所要求的发动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来做”^{[35]771}的办法。以汪丕应组织的移民大队为先导,绥德分区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发动移民南下的移民英雄,移民数量在1944年达到历年顶峰。单是米脂县截至3月底就移出1057名劳动力,远远超过全年移出500人的计划,成为“从一般号召与少数的个别动员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之转变的起点”。^[38]

表3 抗战时期绥德地区(分区)“下南路”移民统计表

	1937-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合计
户数	8527	1304	471	1836			
人口	27740	5318	1483	4961	7069	3426	49997
全劳动力			571	2293			
半劳动力			235	473			
合计劳动力			688.5	2529.5	5928		

资料来源:1.1937-1940年移民数出自《边府划定移民垦区,颁布优待办法,设立移民站》,《解放日报》1942年2月12日,第4版。2.1941年移民数为1941年1-4月统计数据,出自《四个月移民一千余户》,《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第2版。3.1942-1943年移民数出自《绥德分区移民统计表》,榆林市档案馆,档案号:0006-01-1943-Y-0007-0004;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编印,1944年,第5-6页。4.1944年的移民数出自《绥德分区地委会专员公署联合指示——关于1945年发动移民南下生产的指示》,榆林市档案馆,档案号:0006-01-1945-Y-0448-0001。5.1945年移民数出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307页。

^①1942年马丕恩一家从米脂移到延安,仅一年时间就摆脱赤贫,生活迅速改善。边区政府特予嘉奖,并通令各县普遍宣传马氏父女的模范事迹,号召群众努力生产。绥德分区各县利用这一生动实例开展“马丕恩移民运动”,派干部下乡宣传组织移民。

历史上,“下南路”移民迁入地主要是陕西南部,即边区直属各县(1942年设立延属分区);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场移民运动中移民得到了边区政府的精心安置,边区采取政府赈济、发放贷款和群众互济相结合的办法尽力解决移民初来时的困难。大批移民来后能安居乐业,“首先因为边区人民与政府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困难”,^[39]提供粮食、农具和贷款等方面的帮助,建立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基础,逐步改善生活才有了可能。此外,边区还采取措施充分满足移民各方面需求:平等的民主政治权利、衣暖食饱的经济生活、和谐互助的情感认同,从而保障移民迅速融入迁入地的日常生活。由于绝大多数都属于农民,“下南路”移民主要从事垦荒、纺纱和做工等生产事业,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生产劳动军”。^[28]对于移民来说,“下南路”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从事生产,只有生产才能获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对于边区来说,鼓励移民自力生产既是边区安置移民的积极手段,也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

可见,从赈济救助到移民政策的完善,再到移民运动的开展,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对“下南路”移民问题的处理经历了由被动转为主动、从逐渐适应到加以合理利用的过程。这一因应之策优化了人口分布,凝聚了政治认同,推进了文化传播,对发展边区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持长期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回望历史,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中同样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辉煌成就,“下南路”移民运动即是一例。“下南路”作为一种逃荒性质的迁徙活动曾在古代陕北社会非常普遍,但在缺乏官方帮助和组织下的移民活动是自发的零星的,移民也难以立足并长久居住。而在抗战时期,党在边区开展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开启了陕北社会重建的新纪元。同时,密切联系群众、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党的执政基础,“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40]⁴⁵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安置成为边区一项利党利民的重要工作,同边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为了适应发展经济、巩固边区和坚持抗战的需要,党巧妙利用传统资源化被动为主动,将“下南路”这一历史上农民自发的逃亡路、谋生路变为党和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富裕的翻身路、致富路,凸显出在复杂形势下党的创新思维和应变能力。与青年为追求政治理想而北上“到延安去”相对应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善自身生活水平而“下南路”,两者共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磁场”和美好“乐土”。

参考文献:

- [1] 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 [2] Pauline · B ·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M]. S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 [美]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M].葛剑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4] 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 [5] 陕西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 [6] 延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市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7]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榆林市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 [8] 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一) [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 [9] 袁德新.陕西之社会文化:陕北社会状况一瞥[J].新陕西月刊,1931(9).
- [10]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 [G].内部资料,1992.
- [11] 霍子乐.欢迎移民难民开荒[N].解放日报,1943-03-20(2).
- [12] 梁严冰.1928-1932年的陕北大旱灾及其影响[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 [13] 中共绥德县委史志办公室.抗战时期的绥德分区[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
- [14] 绥米等地逃徙难民市县府予以救济,分送难民工厂设法安插并参加开荒地四五万亩[N].新中华报,1939-09-29(3).
- [15] 绥德专署来函催询捐粮成绩,因该地灾胞亟待救济[N].新中华报,1940-09-15(3).
- [16]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17] 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0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18] “逃避兵役”:绥米壮丁向边区逃跑[N].新中华报,1938-05-25(2).
- [19] 曾维华,程声通.环境灾害学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
- [20] 蔡源明.我国北方各省将化为沙漠之倾向与实证[J].东方杂志,1926(15).
- [21] 海燕.风沙延绥道——警区杂记之一[N].解放日报,1942-04-18(2).
- [22] 乐天宇,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940年) [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23] 张志红.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J].殷都学刊,2002(1).
- [24] 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25] 谢觉哉.一得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G].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 [27] 柴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8] 吴力永.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延安县的移难民[N].解放日报,1943-02-20(4).
- [29]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 [3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1] 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2] 朱鸿召.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卷[G].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 [33] 田方.今年冬季移民工作[N].解放日报,1944-11-28(2).
- [34] 南泥湾垦区新气象,调整土地进行生产,扩大农场改进技术[N].解放日报,1943-02-02(2).
- [35] 毛泽东选集[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 [36] 清涧移民工作宣传方式好,有威信者个别解说最有效[N].解放日报,1943-06-04(2).
- [37] 绥德分区展开移民南下运动[N].解放日报,1944-02-29(2).
- [38] 绥米总结移民工作,二千余人南下生产,过剩劳动还多尚须继续努力[N].解放日报,1944-04-20(2).
- [39] 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M].内部资料,1944.
- [4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肖金]

A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Go Down South” Im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XUE Hao¹, ZHU Xin-wu²

(1.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Xi'an 710065, Shaanxi;

2.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Fujia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war, the famine and the resulting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 migration route from the north of northern Shaanxi to the south, known as the “Go Down South” gradually formed. This spontaneous and scattered immigration activity continued until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mov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had timely responded to the situation, gradually improved immigration policies, transformed spontaneous and scattered the “Go Down South” immigration activities into organized and planned government actions, and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masses to develop into an influential mass movement. In this regard, the rise of the “Go Down South” immigration movement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traditions, prac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policy support.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ationally allocating labor force, improv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Key Words: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Go Down South”; immigration